

中国
图书
年鉴

2000

ZHONGGUOTUSHU
NIANJIAN

中国图书年鉴

ZHONGGUOTUSHU
NIANJIAN

2000

杨牧之 主编

湖北人民出版社

ISBN 7-216-03509-7



9 787216 035095 >

鄂新登字 01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图书年鉴, 2000/杨牧之主编.
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 2002. 10

ISBN 7-216-03509-7

I. 中…

II. 杨…

III. 出版发行目录—中国—2000

IV. Z85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77176 号

中国图书年鉴(2000)

杨牧之 主编

出版: 湖北人民出版社
发行:

地址: 武汉市解放大道新育村 33 号
邮编: 430022

印刷: 文字六〇三厂

经销: 湖北省新华书店

开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张: 65.75

字数: 2029 千字

插页: 5

版次: 2002 年 10 月第 1 版

印次: 2002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 000

定价: 145.00 元

书号: ISBN 7-216-03509-7/Z·37

中国图书年鉴编委会

顾问	于友先								
主编	杨牧之								
副主编	阎晓宏	吴尚之	路用元	刘鼎华					
编委	(按姓氏笔画排列)								
	于文杰	马元春	马笑然	王伟	王成法	王岳	巨伟		
	石伟	叶路	史可荣	白烨	成云东	任桂香	刘玉山		
	刘艳丽	孙颢	朱冬生	朱赛玉	伍先华	寿勤泽	苏立功		
	李华文	李显福	李莉	吴体刚	陈莹	汪嘉伦	张炜		
	张樱	杨旭红	杨德炎	邱久钦	周思	罗见龙	项纯文		
	赵昌平	胡福生	夏代忠	聂震宁	高洪宝	郭志坤	朗杰平	措	
	殷爱平	黄日星	黄正慧	韩舞凤	熊国祯	樊希安	德博		

中国图书年鉴编辑部

主 任	胡光清				
副 主 任	刘 苏				
文字编辑	卢净璇	刘	苏	李 鹏	赖洁玉
责任分类	李 鹏				
编 务	章 玮				
电子编辑	陈 革				
责任印制	杜义平	肖正华			
责任校对	余兆伟				
美术编辑	朱永锴				

编辑说明

一、编辑《中国图书年鉴》是我国图书出版事业的一项基本建设,其宗旨是总结图书出版工作经验,观察、分析图书出版的现状与发展趋势,为科研、教学、著述、学习和图书出版工作提供系统的参考资料。

二、《中国图书年鉴》与《中国图书大辞典》(1949~1992)的收书截止时间相衔接,对从1993年起国内出版的图书及资料进行收集整理,每年编辑出版1卷,本卷为总第7卷。

三、《中国图书年鉴》(2000)主要反映1999年度全国图书出版工作的状况和信息,其主要栏目有“专论”、“图书分类评述”、“图书出版研究”、“图书市场分析”、“新书简介”、“获奖书目”、“统计资料”、“图书出版纪事”、“索引”等。

“专论”——选载对全国图书出版有指导性意义的重要论文。

“图书分类评述”——特邀国内有关专家、学者及图书出版编辑,对各类图书的出版动向作评论分析。

“图书出版研究”——选录各报刊杂志上发表过的有关图书出版研究的文章。

“图书市场分析”——选录报刊杂志上发表过的有关文章,汇集图书市场信息,分析其发展态势。

“新书简介”——从当年新版图书总数中,按10%~15%的比例选取优秀图书和有代表性的图书,以条目形式作介评,并按学科分类编排。辞条以介为主,寓评于介,着重反映所诠释图书的基本内容及主要特征。

“获奖书目”——主要刊载该年度荣获“国家图书奖”、“五个一工程·一本好书奖”、“中国图书奖”、“中国辞书奖”的书目。

“统计资料”——汇编该年度全国图书出版情况,使用《中国标准书号》22类图书出版情况,各类课本以及少年儿童读物出版情况,图书销售及库存情况,图书出口、进口情况等。

“图书出版纪事”——记录该年度有关图书出版的重大活动。

“索引”——有“辞目分类索引”和“辞目笔画索引”。“辞目分类索引”以《中国图书馆图书分类法》(第四版)为框架,其编排方式与新书简介的正文相同;“辞目笔画索引”按辞目首字笔画数顺序编排。索引前注有使用说明。

四、编辑出版《中国图书年鉴》是一项文化积累和文化传播工程,此项工作得到了全国出版同仁及有关专家学者的支持与帮助,在此致以诚挚谢意。由于我们的水平和经验所限,该年鉴难免有不足和缺憾之处,恳请广大读者和各界人士批评指正。我们将不断改进工作,提高质量,以满足广大读者的需求。

11/15/05

目次

专 论

新中国出版的五十年	1
我们为什么要实施图书精品战略	4

图书分类评述

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类图书出版综述	9
哲学类图书评述	11
社科总论类图书出版简评	14
政治、法律类图书综述	18
军事类图书综述	20
经济类图书评述	24
文化、科学、教育、体育类图书简评	28
语言文字类图书述评	30
文学类图书综述	32
艺术类图书综述	34
历史、地理类图书简述	36
自然科学总论类图书评述	39
数理科学和化学类图书综述	42
天文学、地球科学类图书综述	45
生命科学类图书综述	48
建筑类图书综述	49

图书出版研究

我国图书出版现状及展望	52
关于国家图书奖获奖情况的分析	54
中国图书出版业现状观察与未来展望	59
未来辞书出版业的三大竞争	63

面向 21 世纪的中国出版业:机遇与挑战

出版策划的八大效应	68
定位·形象·系统——出版社整体策划论	73
图书出版编辑工作自动化初探	75
图书版权国际贸易中应注意的主要问题	78
版权贸易:精品“助推器”	80
选题策划中的书稿资源开发问题	82
图书质量问题剖析与解决对策	85
少儿读物十大现象	87
经济类图书出版的第二次浪潮	90

图书市场分析

我国图书市场现阶段特点及出版社的

对策	92
市场化整合:中国书业迈进 21 世纪的抉择	95
世纪之交图书市场的新竞争	98
青年读物出版:读者、市场与发展	100
农村图书市场管理的现状及趋势	102
中国图书海外发行:问题与对策	105
图书连锁经营发展分析	106
中国读者图书消费状况分析	108
一般图书发行滑坡透视	111
图书的市场营销策划	114
我国网上书店的现状与发展对策	116
中国计算机图书市场现状	118
Internet 网上的图书营销业	

——21 世纪图书发行研究的新课题

.....	121
-------	-----

非标价销售:图书销售的新尝试 124

新书简介

A	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	126
B	哲学、宗教	132
C	社会科学总论	161
D	政治、法律	178
E	军事	233
F	经济	243
G	文化、科学、教育、体育	327
H	语言、文字	377
I	文学	410
J	艺术	518
K	历史、地理	565
N	自然科学总论	653
O	数理科学和化学	662
P	天文学、地球科学	677
Q	生物科学	691
R	医药、卫生	703
S	农业科学	740
T	工业技术	760
U	交通运输	849
V	航空、航天	855
X	环境科学、安全科学	857
Z	综合性图书	862

获奖书目

第四届国家图书奖获奖名单 874

第七届“五个一工程”获奖图书名单 ... 880

第三届国家辞书奖获奖名单 882

统计资料

1999年图书出版情况	884
1999年使用《中国标准书号》22类图书出版情况	884
1999年各类课本及少年儿童读物出版情况	886
1999年图书发行网点情况	887
1999年图书购进情况	887
1999年图书总销售及库存情况	888
1999年各类图书销售情况	888
1999年各类图书出口情况	889
1999年各类图书进口情况	889

图书出版纪事

1999年图书出版纪事 890

索引

辞目分类索引	898
辞目笔画索引	974

新中国出版的五十年

于友先

在普天同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五十华诞的日子里,作为一名出版工作者,追昔抚今,新中国出版事业五十年来进步,不时在脑海浮现。出版作为一种大众传播手段,服务于国家的各项事业,正可谓国运兴,则出版兴。各种出版物真实地记录着五十年的风雨坎坷和旷世辉煌,广大出版工作者也与共和国一道同喜同悲,同呼吸共命运。五十年的新中国出版史,可以从一个侧面作为新中国半个世纪奋斗历程的生动写照。

(一)

中国共产党从诞生那一天起,就十分重视出版工作,我们党的主要创建人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都曾在党的初创时期进行了大量的出版活动。陈独秀主持出版了《新青年》,李大钊积极参加了编辑工作,并是主要的撰稿人;毛泽东主编了《湘江评论》。与此同时,全国许多地方的马克思主义小组还创办了《共产党》月刊、《励新》半月刊、《武汉星期评论》等,1920年,陈望道翻译出版了《共产党宣言》。这些出版活动不仅传播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而且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做出了充分而又有效的思想舆论准备。从此,我们党所直接领导的这支出版大军,从上海走到了瑞金,从瑞金走到了延安,再从延安走到了新生的人民共和国。革命和进步的出版物启发和引导了成千上万的人走上革命道路。到1949年,全国解放区已有新华书店分店、支店735处,印刷厂29个,拥有职工近万人的专业出版队伍。与革命出版大军一同奋斗的还有长期战斗在国民党统治区民主的和进步的出版力量,他们以鲁迅、邹韬奋、胡愈之等人为杰出的代表。他们在白色恐怖之中,传播真理,提倡科学、民主的精神,抨击反动政府的统治,与在解放区的革命出版队伍形成强有力的呼应之势。这两支革命出版大军由于新中国的建立而得以会合,

标志着新中国出版事业在其诞生之初就表现出了鲜明的革命性和进步性。

旧中国留给人民共和国一个衰落凋零的出版业,1949年,全国仅出版图书8000余种,总印数1.05亿册;报纸315种,总印数4.12亿份;杂志257种,总印数0.2亿册;全国书刊排版字1.22亿字,铅印印刷13万令,全国出版用纸不足3万吨。新中国成立后,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1949年成立了出版委员会,并于10月召开了全国新华书店出版工作会议,毛泽东同志为此次会议题词:“认真做好出版工作”,对新中国的出版事业寄予厚望,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他在中南海颐年堂亲切接见了与会的全体代表。会议指出:为人民大众的利益服务是人民出版事业的基本方针。10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任命胡愈之同志为出版总署署长,叶圣陶、周建人为副署长。政务院于10月28日发出了《关于改进和发展全国出版事业的指示》,明确提出:书籍杂志的出版、发行、印刷是三种性质不同的工作,原则上应当逐步实现科学的分工;出版总署应当协助各大行政区分别筹建、改进或扶植地方的出版工作;国营书店应团结与组织一切私营书店,共同把书刊发行工作做好;书籍期刊的出版发行,不论公私经营,均不得单纯以营利为目的。建国初期,出版总署用了很大力量来统一全国的出版事业,逐步做到了统一书籍编校制度、统一版本格式、统一书刊定价、统一书刊字体和版本记录、统一书刊稿酬、统一书刊进出口工作。从1950年起,人民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青年出版社、人民教育出版社、人民美术出版社、人民卫生出版社、科学出版社等相继成立。《新华月报》和《人民文学》相继创刊,毛主席还分别为这两本杂志的创刊号题了词。新中国的出版事业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在广大人民群众的热情支持下,很快焕发出勃勃生机,先后出版了《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其中汉文版到

1965年共发行1114.9万册,这在中国的出版史上是前所未有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和《列宁全集》也相继问世。随着文学创作的繁荣,文学图书出版也取得了空前的成就,《红岩》发行了712万册,《保卫延安》发行了238万册,《烈火金刚》发行了252万册,《红旗谱》发行了217万册。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图书的出版也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绩,侯外庐主编的《中国思想通史》、胡乔木的《中国共产党三十年》、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吕叔湘、朱德熙的《语法修辞讲话》都是在这个时期出版的。华罗庚的《数论引导》和《堆垒素数论》、钱伟长的《弹性圆薄板大挠度问题》和钱学森的《工程控制论》的出版,标志着我国的科学研究和科学出版都达到了新的水平。到1956年初,我国出版业基本完成了对私营出版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形成了以国营出版为主体,编印发合理分工,法规制度统一的出版体系。这一年,全国出版图书28773种,总印数17.8亿册,分别是1949年的3.6倍和17倍;出版报纸26.1亿份,杂志3.53亿册,分别是1949年的6.3倍和17.7倍;全国书刊铅印283万令、胶印印刷207万令,分别是1949年的21.8倍和96.6倍。

由于反右斗争的扩大化,加上“大跃进”期间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猖獗,出版工作受到很大的影响。一些地方不顾出版工作的内在规律,搞所谓的出版竞赛,把编辑周期缩短到完全违背客观规律的程度,有的社甚至十几个小时就出一本书。一些图书粗制滥造、质量低劣。广大出版工作者的积极性不仅没有在大跃进中调动起来,反而受到极大的伤害。持续十年的“文化大革命”给我国的出版事业带来了严重的摧残和破坏,出版管理机构基本瘫痪,许多出版工作者被下放劳动,书刊结构严重失衡。1967年,全国图书品种猛降至2925种,比1965年减少了17218种,全国仅出版杂志27种,比1965年减少了763种。“文化大革命”期间,全国因政治性原因报废图书的总码洋达2.8亿元。

(二)

1978年1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不仅给我们的国家带来了新生,也给出版工作带来了新生。随着全党全国工作重点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来,出版事业在拨乱反正的同时,恢复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1978年12月,在江西召开了少儿读物出版工作座谈会。经中央批准,动用国家储备纸紧急重印了35种中外文学名著,并及

时出版了一大批读者渴望已久的各种图书,这对于缓解十年浩劫造成的严重“书荒”起了非常积极的作用。在新时期出版工作的历程中,1979年的长沙会议是值得浓墨重彩书写的。会议明确提出新时期出版工作的基本任务是,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传播、积累科学文化知识和成果,丰富人民的精神文化生活,为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为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建设服务。会议提出地方出版社出书不受长期形成的地方化、通俗化、群众化的限制,可以“立足本省,面向全国”。这对于解放出版生产力,调动广大出版工作者的工作积极性,形成出版事业新的格局产生了深远的作用。今天,在我国出版产业的总体格局中,北京、上海这两个老基地继续焕发着青春活力,湖南、江苏、浙江、湖北、广东、辽宁、四川等地也已经或正在形成辐射全国或周边地区的出版中心、发行中心。

1983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了《关于加强出版工作的决定》。《决定》分析了出版工作所面临的形势,指明了出版工作的任务、性质和指导方针,对出版工作已经进行的改革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决定》指出:“出版事业的发展,既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方面,又是物质文明建设的组成部分和重要条件。”“我国的出版事业,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出版事业根本不同,是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必须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根本方针,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传播一切有益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科学技术和文化知识,丰富人民的精神文化生活。”《决定》的颁布,及时有效地解决了出版事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出现的重大思想和理论问题。《决定》所确立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思路,仍然对指导今天的出版工作有着重要的作用。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的出版事业以改革为主线,抓繁荣,促发展。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随着市场因素作用的加强,出版改革首先在发行领域展开。1982年,国家出版局确定了图书发行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在全国组成一个以国营新华书店为主体的,多种经济成分、多种流通渠道、多种购销形式、少流转环节的图书发行网。“一主三多一少”对于解决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形成的图书发行的僵化模式,有着很强的针对性,就是到了今天,对图书发行体制改革仍然有着现实的指导意义。1988年4月,中央宣传部和新闻出版署提出了深化图书发行体制改革的要求,即放权承包,搞活国营书店;放开批发渠道,搞

活图书市场;放开购销形式和发行折扣,搞活购销机制;推行横向联合,发展各种出版发行企业和企业集团。通过改革,我国图书发行业逐步形成了国有书店、集体个体书店共同参与市场竞争的局面,方便了广大读者购书,加快了图书的物流和信息流。出版单位的经营机制改革着眼于扩大经营自主权,调动生产积极性。1984年在哈尔滨召开了全国地方出版工作会议,提出要适当扩大出版单位的自主权,提高出版单位经营的主动性。要求出版单位从单纯的生产型向生产经营型转变。此后,许多出版单位根据客观条件的变化,加强了内部经营管理,讲求成本核算,引进竞争激励机制,逐步适应了急剧变化的外部环境,形成了新的工作机制和竞争实力。出版改革的成果集中体现在一大批重要的出版物得以问世。《邓小平文选》一至三卷的出版,为全党全国人民学习邓小平理论提供了最重要的教材,也是我国出版史上的一件大事。《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共发行2000多万册,成为新时期发行量最大的图书。在社会科学、文学艺术、科学技术等方面,也有大批精品与读者见面。《中国大百科全书》、《汉语大字典》、《汉语大词典》、《中国美术全集》、《机械工程手册》、《中国医学百科全书》、《中国农业百科全书》、《英汉大词典》等都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和阅读价值,其工程之巨大、学术水准之高,在中国出版史上都是可以留下一笔的。

出版业在此间的发展还有两个鲜明的特点,一是媒体形态逐步增多,二是科技水平明显提高。20年前,当人们谈到出版的时候,几乎就只有纸介质这样一种概念,全国只有中国唱片总公司能够生产木纹、胶木和薄膜唱片和录音磁带。80年代中期,录像带开始出现,90年代后,激光视盘和唱盘、VCD、DVD等新型的出版介质很快在我国出版业广泛采用。电子出版物在我国起步于80年代,先后出现了软磁盘(FD)、只读光盘(CD-ROM)、交互式光盘(CD-I)、照片光盘(PHOTO-CD)、高密度只读光盘(DVD-ROM)。到1999年10月,我国出版的电子出版物已逾5000种,《毛泽东》、《邓小平》、《中国大百科全书》、《四库全书》、《中国美术全集》等达到了很高的设计和制作水平。《颐和园》、《故宫——世界文化遗产》等五种光盘分别在两届“莫必斯”多媒体国际大赛中获奖。编辑技术手段的计算机化已在许多出版单位实现。1974年,经国务院批准,为解决汉字的计算机排版问题,北京大学的王选教授等开始研制汉字激光照排系统,他们成功地跨越了国际

上第二代、第三代照排机,直接研发出能够处理汉字信息的第四代激光照排机,掀起了我国印刷业的一场技术革命。我国的印刷业逐步告别了“铅与火”,进入了激光照排、胶印印刷、装订联动等具有较高技术含量和规范的新时代。

(三)

1992年,小平同志视察南方发表重要讲话,极大地促进了全党全国人民的思想解放。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使我国的改革与发展进入到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十多年的快速发展,出版业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也积累了一些结构性的问题,随着外部环境中市场经济的因素逐步强化,如果不及时地解决这些结构性的问题,将会影响到现实以及长远的发展。1994年初,新闻出版署党组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推动出版工作实现从总量增长为主要特征的阶段向以优质高效为主要特征阶段性转移的思路,通过转移,逐步建立符合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要求,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反映出版业自身发展规律新的出版体制。阶段性转移从一开始提出,就包含着两个方面的任务,一是要实现体制转轨,二是要实现增长转型。1995年,中央政治局党委会议听取了新闻出版署党组的工作汇报,肯定了阶段性转移的工作思路,并对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加强和改进出版工作提出了非常重要的指导性和原则性的指示和意见。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中明确提出:“加强对新闻出版业的宏观调控,采取有力措施解决目前总量过多、结构失衡、重复建设、忽视质量等散滥问题,努力实现从扩大规模数量为主向提高质量效益为主的转变。”阶段性转移这一工作思路很快得到了全国出版界的积极响应,各级出版管理部门也采取了许多举措来推进出版业的阶段性转移。

为了建立新的出版体制,党和国家对出版立法工作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出版管理条例》、《音像制品管理条例》、《印刷业管理条例》相继颁布。这些条例明确了出版者、印制者、发行者的权利和义务,规范了各级出版管理机关的权利和职责,改变了过去法规等级偏低、系统性不强、执法力度不够的状况,标志着我国的出版法制建设取得了重大进展。新闻出版署还依据有关条例,十四大以来,先后制定行政规章和规范性文件200余件,出版管理的诸多环节、管理行为的许多方面都有了比较明确的规范,出版

管理已经基本做到有法可依。党的十五大对新闻出版工作提出了“加强管理,优化结构,提高质量”的总要求,这也是阶段性转移的重要内容。新闻出版署从深化出版体制改革入手,把优化结构作为出版体制改革的主要内容,先后批准建立了广州日报集团、南方日报报业集团、羊城晚报报业集团、文汇—新民报业集团、光明日报报业集团和经济日报报业集团;批准建立了中国美术出版集团、北京出版集团、广东出版集团、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并且正在积极推进出版业的集约化步伐。新闻出版署先后制定了图书、报刊的质量管理标准,加大了检查力度,各出版单位对质量问题的敏感性和自觉性也明显提高。1998年,通过对564家图书出版社的1785种图书的抽查,质量合格率达到78.1%,这表明出版物质量正在逐步提高。1996年,新闻出版署先后制定了《“九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九五”国家重点音像制品出版规划》和《“九五”国家电子出版物出版规划》,启动了“中国动画‘5155’工程”、百刊工程和社刊工程。“九五”重点图书出版规划已完成近60%。阶段性转移

在保证出版工作的社会效益的同时,也提高了经济效益,使得出版业的经济实力明显增强。近五年来,我国出版业的利润以平均每年20%的水平增长,1998年,全行业销售收入超过千亿,利润超过百亿。我国期发量超过百万份的期刊已有25家,其中有11家进入世界期刊发行的前50名。1998年,我国报纸的广告收入达115亿元,其中超亿元的有40家。

新中国的出版已经走过了五十年辉煌与曲折并存的历程,辉煌已载入史册,曲折会使我们更加清醒。值此世纪之交,在二十一世纪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出版业担负着更加神圣的使命。我们一定要把江总书记提出的:“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切实加以贯彻落实,进一步加强管理,优化结构,提高质量,在新世纪更加宏大的舞台上,创造中国出版的新的辉煌。

(原文载《新闻出版报》1999.11.10.)

我们为什么要实施图书精品战略

杨牧之

图书精品战略研讨是很有意义的活动,其目的是在当前深化改革这样一个关键时期进一步树立图书精品意识,促进图书精品战略的实施,以使更多的优秀图书脱颖而出。我谈三个问题:第一,当前在什么形势下实施精品战略;第二,为抓好精品战略,我们必须加强管理、优化结构、提高质量。第三,当前在图书出版中的一些主要倾向和问题。

一、为什么今天我们特别强调实施精品战略

从宏观方面讲,随着改革开放的迅猛发展,今日出版工作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的贡献越来越大,地位日趋重要和提高。当然,抓精品是我们出版事业的永恒主题,但我们今天讲出精品与5年、10年乃至20年前的内容已不可同日而语。今年9月下旬,我们在湖南长沙举办第十届全国书市,对此深有体会。当地从党政领导到普通读者对此书界盛会极为欢迎。为什么?因为它不但极大地带动了当地宾馆、饭店、旅游业消费,而且这一图书展销活动,成为全

社会的文化活动。出版一本好书使出版社受到全社会的关注;一次图书展销活动成为全社会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全社会关注出版事业的体现,也是出版业地位大大提高的表现。另外,全国很多省、区党政领导甚至省委书记第一把手亲自关注出版工作,把出版产业作为支柱产业和骨干工程。我认为这也是前所未有的。从此也可以看出我们出版工作的地位和贡献。

从微观方面讲,从行业本身讲,现阶段,我们的出版业已取得突破性进展和历史性成绩。

第一,最突出的一个表现,就是整个出版业思想空前统一,大家十分强烈地、非常迫切地要求深化出版改革。这表明大家要把出版产业搞得更好,“更上一层楼”。而大家的思想又都统一到十五大精神上,要按十五大的要求去办。这是出版业形势好的最重要的表现,是出版事业繁荣发展的基础和前提。

第二,这些年来,我们认真总结了经验教训,制定完善了包括从《出版管理条例》、《印刷业管理条例

例》、《音像管理条例》到《图书质量保障体系》等在内的出版法规体系。这些都是新中国成立 50 年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 20 年来大家经验教训的总结,是非常宝贵的财富。交通管理有红灯和绿灯,大家都会承认,红灯的约束是绿灯畅通的保证。对一个产业来讲,规章制度至关重要,同样是我们顺利工作的保障,我们应该认真学习,切实遵循。

第三,我们的出版业这些年已积累了雄厚的物质基础。据有关部门统计,六七年前全国资产总额在 5 000 万元以上的出版社只有六七十家,但现在的情况已大大发生变化:销售收入在亿元以上(1 亿到 5 亿不等)的出版社有 59 家,销售收入在 5 000 万到 1 亿元的出版社有 60 多家,销售收入在 1 000 万到 5 000 万元的出版社有 90 多家,由此可以看出出版业的家底以及规模的扩大、进步和发展。

新闻出版署党组提出阶段性转移战略以来,我们在经济效益和规模经营等方面取得飞速进展。1995 年,我们实现“两减两增”的效果。先讲“两个减少”。一个“减少”是:图书品种总量减少 2.4%。十多年来我们一再强调要控制图书品种,后来甚至提出要减少品种。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图书出版总品种与其人才队伍,编印发等条件发展速度不相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出版业图书品种总量从 1.5 万、1.7 万、3 万、7 万、8 万种一直攀升到 10 万种,1995 年第一次出现了下降的态势。1994 年初,在全国新闻出版局局长会议上署党组提出阶段性转移的思路,很快便取得了成果。总品种虽然只下降 2.4%,但这是我们整个行业十几年来共同奋斗的结果。另一个“减少”是:新书品种减少 15%。品种总量减少同时新书品种也大大减少,这“两个减少”是现阶段我们的追求。再讲“两个增加”。一个“增加”是重版率增加 10%,另一个“增加”是总印数达到 65 亿册。总之,总品种下降,总印数上升。“两个减少”是我们奋斗的结果,“两个增加”是我们追求的目标。两增两减充分说明了出版业质量效益的提高。1996 年在这个基础上继续提高,继续前进。虽然总品种增加了 9%强,但新书品种只增加 3.6%,重印书却增加,利润比 1995 年增加 10 亿元,重版率达到 45%。应该说,这是良性增长。1997 年总印数突破 70 亿册,达到 73 亿册,利润由 1995 年的 17 亿元,1996 年 27 亿元,增长到 30 多亿元。1998 年,总品种 13 万种,重版率 44%,利润达到 44.7 亿元。出版业产业基数越来越大,在这个基数上增长 1%便十分可观,出版业的连续增长在整个国民经济中也是很少见的。

总之,现阶段出版业的增长呈现出以下特点:第一,连续 4 年持续增长;第二,从规模数量增长转变成质量效益增长,呈现出内涵发展态势,这是很可喜的;第三,这些年,我们出版业的大局意识、政治意识空前增强,大大提高,这是我们事业发展的首要条件和重要的标志。

与此同时,出版业也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和挑战,也面临着很多问题。

首先,过快的品种增长与现阶段出版业各方面客观条件不相称。特别是少数省,年图书品种的增长幅度超过 30%,给控制总品种带来一定难度。所以,我们郑重提醒大家,在大好的形势下应该看到值得注意的苗头,首要一点,就是图书的总品种又出现过快增长倾向。

其二,出版业的确发展非常快,但是与国内其他发展更快的行业和国外出版强国相比,我们的规模还是有限。从国内方面来讲,来自其他行业的竞争压力很大。我举个具体的例子。比如邮政系统成立邮政书店,这方面有代表性的是福建省。1990 年创办了邮政书店,一年的码洋只有几百万,经过几年的努力,现在其销售码洋已达到六七千万元。邮政系统利用其信息网络、运输、资金、场地等优势,迅速发展,渐成规模,给我们的发行系统带来很大压力。市场经济讲究公平竞争,从发行角度讲,总批发、二级批发、零售等等,各行其路,谁把书发出去都应该欢迎。我们出版业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和挑战。从国际方面来讲,正如大家所熟悉的,当我们千方百计走进国际市场并努力扩大已有份额的时候,外国的出版商也在大步向中国的市场进军,可以预见,在不久的将来,这场竞争不仅仅是在国际市场上,也要在国内市场上激烈地展开。在我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育尚不完善的背景下,在我们自己尚不具备充分的条件的时候,这场竞争带来的威胁就更大,迫使我们正视威胁,增强紧迫感,应该立即做起,准备应战。

其三,出版业内部还存在着许多问题。除图书品种过快增长倾向外,其他问题如图书差错率太高,平庸书太多,结构不合理,出版社内部大锅饭体制等依然制约着书业的发展。我们 560 多家出版社中有许多还是按照传统的计划经济模式经营,特别是那些大的老的出版社,问题更加严重,应当切实抓紧相应制度的改革工作,尤其是人事、分配和社会保障等“三项制度”的改革。

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在知识经济中充当重要角色的新闻出版业,所承担的积累、传播知识的

使命重大,事关民族、国家前途。在这样一个关键时刻,新闻出版业要抓住机会,迎接挑战。从总的方面说,我们的出版业迎来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但同时还存在很多问题,特别是体制方面的问题,传统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问题,由粗放型经营向集约型经营转变问题。挑战就是压力,挑战就是动力,迎接这个挑战我们就会有新的突破,就会达到更高的水平。

二、加强管理、优化结构问题

结构是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建立有中国特色的新闻出版体制,必须建立与之相适应的产业结构、产品结构、价格结构、分配结构、队伍结构。朱镕基总理讲过,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国际经济结构重组趋势的迅速发展,国有经济特别是传统产业的结构调整和优化必然加快。从总体上讲,出版产业属于传统产业,而且产业结构问题更为严重。这个结构性矛盾,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在卖方市场条件下尚不突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在买方市场条件下,就逐渐暴露出来了。到国内500多家出版社改革更快、竞争更激烈的时候,到国际出版商打入中国市场的时候,中国出版业结构性矛盾将越来越突出,而这个矛盾不解决,就会在竞争中败下阵来。就产业结构而言,各地趋同问题突出。无论是宁夏、新疆、青海、甘肃,还是江苏、浙江、山东、辽宁,大体上都是一个产业结构和格局:你有人民社,我也有;你有文学社,我也有;你有少儿社,我也有;你有科技社,我也有。正如有的同志比喻的,没有金矿却要开办黄金加工厂。这不符合经济发展规律。前几年,署党组提出实施不均衡发展战略,即针对均衡发展而言。另外,出版产业结构单一。出书就是出书,极少数出版社办刊物,办报纸的就更少。国际市场上,一般而言,大型出版商都是综合型发展,各媒体之间互相促进,资源共同开发,共同利用。我们与之相较,差距不小。就产品结构而言,教材、教辅、教参,无论在利润还是品种方面都占有很大的比例,不但严重增加了中小學生负担,而且编辑队伍素质也会因之下降。就价格结构而言,从改革开放以来出版产业价格机制日趋放开,出版社基本上按成本加利润定价(当然,教材还有一些特殊规定)。但是,现在价格结构问题十分严重,特别是那些打着协作出版之名而实为“买卖书号”类的图书大大冲击了出版物市场。高定价,低折扣,定价一千元,二三百元即可出手,严重干扰了图书市场。怎么办呢?恢复旧制恐怕不行,形势要求我们必须进一步对

价格结构进行深度改革。就分配结构而言,“平均主义”是主要问题,这不必多讲。就队伍结构而言,出版业队伍素质存在很多问题。一方面,这些年出版队伍发展壮大,很多年轻同志从事出版工作,大大增加了出版界活力;另一方面还有很多的编辑不愿意为他人作嫁,对工作敷衍了事,责任心淡化。忙于耕耘“自留地”,忙于“三产”创收。总之,这些结构性问题已严重影响出版事业的进步和企业的发展,而结构问题是深入出版改革的核心所在。

下面我向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在深化改革方面的想法和进展情况。十五大以来,大家遵循十五大精神,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抓住机遇,开拓进取,我们的事业大大发展,我们的改革不断向前推进。十五大之后,特别是近一二年来,出版业的改革出现一个好的气象,这个气象就是对改革更加冷静,更加清醒,更加理性,在保持热情的前提下,认真思考,调查研究,制定方案,积极探索,形势确实喜人。

第一,发行改革进展情况。

发行业改革起步较早,应该说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发行改革一直在不停顿地进行。因为大家在实践中认识到,发行成了出版业发展的瓶颈,制约出版业的发展,所以,首先要将发行改革抓上去。20年来,发行改革大体走了“三大步”。第一步,即1982年提出的“一主三多一少”。这一改革措施,重在突破国有书店独家经营、渠道单一、周转失灵的僵持局面。多种购销形式的实行,有利于出版社由单纯的生产型向生产经营型转变;多条流通渠道和多种经济成分并存,推动了国有书店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第二步,即1988年提出的“三放一联”的措施,目的是推动出版发行业内部管理机制的改革。放权承包,建立责任制,搞活国有书店的经营机制;放开批发渠道,活跃市场,增强竞争力度,放开购销形式和发行折扣,试图利用经济杠杆,调整产、供、销之间的利益关系,搞活图书购销。各种形式的出版发行联合体的出现,增强集约经营意识,促进竞争,优势互补。回顾这两个阶段的改革,更多的是围绕流通体系和内部管理体制这两个方面进行的,还没有总揽全局,作通盘考虑,出版发行改革已经到了必须从培育建设社会主义大市场这个课题进行总体规划的时候了。在这个背景下,1996年新闻出版署提出了建立全国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图书市场的目标。应该说,发行体制改革进入了总体设计、整体推进、重点突破、配套进行的阶段。

我考察过日本的发行业,发现日本发行业的一

些做法对我们很有启发。第一,日本出版发行市场基本上由东贩、日贩两家控制,大体占发行市场的70%,剩余份额由其他百家发行公司分享。第二,出版社同时入股这两家发行公司,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东贩搞好对出版社有利,日贩搞好对出版社也有利。第三,出版社自己不搞自办发行,因为成本太高,并不上算。但是也设发行局,其功能为:了解市场行情,督促发行公司进货;了解读者倾向和愿望,反馈意见,为编辑和出版提供信息。我们结合中国国情,对日本、欧洲的经验兼收并蓄,最终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局面。比如新闻出版署批准成立了几个发行集团,意在形成竞争局面,便于市场统一开放,企业跨地区、跨行业、跨所有制经营。当然,从现在情况看,由于刚刚起步,还有很多问题需要研究解决,但逐步会完善起来。

第二,出版改革进展情况。

出版改革,大而言之,指整个出版体制的改革;小而言之,指出版社自身的改革。经过这几年的实践,在出版改革方面,大家已形成三点共识。

第一点共识:与发行改革相比较,出版改革任务更艰巨、难度更大。出版社改革尤其要注意,不但要遵循物质生产的规律,还要遵循精神生产的规律,要保证图书内容没有问题,要考虑“两个效益”。

第二点共识:出版社要提高集约化程度,一是横向发展,一是纵向发展。横向发展、横向联合,难度较大。为什么呢?这是中国国情决定的。我们500多家出版社,都是国有、国营的,每家都有一个主管单位。加之对专有出版权的保护,经营状况尚好,横向联合实现起来困难不少。现在出现同类型出版社的联合趋势。应该说,这势头是好的。纵向发展、纵深发展,比较实际,而且很多大的出版社已开始实行通过自我发展、自我壮大实现发展。比如,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把出书范围分成5类,分别由5个部门向5个专业出版社方向发展,形成自己品牌的特色。又如,科学出版社,在国拨资金逐年减少的压力下,动脑筋想办法,已实现连续3年大幅增长,形成规模经营,很有特色。当然,纵深发展也面临着新的问题,如建立编辑分部、分社问题,这些问题要认真研究,妥善处理。

第三点共识:出版社体制无论怎样改革,首要任务是壮大自己,无论如何要从自身做起,抓紧出版社内部“三项制度”的改革。壮大了的出版社,无论市场竞争怎样激烈,无论兼并联合怎样发展,总会处于有利地位。目前,出版社“三项制度”改革与要求差距很

大。出版社法人在“三项制度”改革上要下功夫,要解决能进不能出的铁饭碗问题,要解决干好干坏一个样的大锅饭问题,同样要考虑解决好社会保障问题。改革是不容易的,要作出很大牺牲,比如岗位责任制的实施,肯定会遇到旧体制既得利益者的强烈反对,但是只要你做得对、做得正,就会得到大多数人的欢迎。出版社领导应有一种气魄和精神,这种气魄和精神就是你不怕得罪人,不怕人家骂,否则,什么也没法办。当然,这是言易行难之事,但是,目标确定后就要一往无前,奋力开拓,不断总结经验,把事情办好。

三、在提高图书质量方面当前应注意的倾向和问题

我们开拓新局面、深化改革的核心就是提高质量,出好书。出版社应把所创造的经济效益投放在出好书的工作上。提高质量,实施精品战略,增强精品意识,应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要树立一种精神,克服三个片面性。

树立一种精神,即树立一种脚踏实地的精神、精益求精的精神、“十年磨一剑”的精神,没有这种精神就不会打磨出精品来。最近,我了解到上海文艺出版社的经验。该社发现好作品后不但请作者来一起讨论,还为作者提供条件,再加修改,仔细打磨,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当然,这样的做法早已有之。比如说,五六十年代的《红岩》、《青春之歌》、《林海雪原》等优秀图书都是编辑、作者和读者共同打磨出来的成果。在读者中保持长久地位的图书都是以“十年磨一剑”的方式打磨出来的。马克思的《资本论》从1843年到1883年写了40多年,没有那40年的努力,能有今天仍然被全世界认为是改变了世界的一部伟大著作吗?凡是常存人间的著作没有一个不是脚踏实地打磨出来的,所以要树立这样一种精神。

克服三个片面认识包括:1. 精品一定是大部头,小册子拿不出手。这个认识是片面的,而从我们中国的实际情况来看,小册子是迫切需要的,通俗读物更是迫切需要的。造成这种偏见的根源除码洋少等发行方面的因素外,恐怕还涉及另外一个思想认识,即小册子没有学问,评奖时不能获得重视。这个认识也是片面的。大家熟知的《鸡毛信》、《三毛流浪记》、《孙悟空大闹天宫》是不是小册子?《大众哲学》、《语法修辞讲话》、《诗词格律》是不是小册子?但这些小册子泽被后世,功莫大焉,为人景仰。中国包括华罗庚、钱学森在内的伟大科学家,都非常重视科普著作的出版,通俗的小册子同样能够传之久远。所以,

要克服这种片面性,要安排出版一些普及、通俗性小册子。2. 平庸书也能卖出去。平庸书是市场的客观存在,不好不坏的书所占比例总是比较大。当然,出版社的社长、总编辑并不是把出版不好不坏的书作为奋斗目标。平庸的书为什么多?这有许多客观原因,比如照顾关系、增加品种以均摊成本、跟风出版等等。有些出版社出于生存的考虑,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应该看到,与其他各业相较,出版业平均利润、平均工资并不低。在这种时候,应该把更多的资金投入精品生产中去。3. 重复书也能卖出去。重复出版问题太严重,这有客观原因,主要是市场发育不完善,缺乏竞争。另外,就是地方保护。对整个国家来说,重复出版,一方面造成浪费,一方面阻碍质量提高。

减少平庸书和重复书的核心在于创新。我们的出版工作不要满足于不好不坏、不要满足于不出错误,要追求创新。

第二,正确认识精品的内涵。

精品是什么?江泽民总书记说:“优秀作品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时代精神的集中体现,在整个精神产品的制作和生产过程中具有重要的示范和影响作用。”这句话有两层意思。一层是从内容方面讲的,即反映时代精神,反映民族精神;一层是从出版制作方面讲的,即要给精神产品的生产起示范作用和榜样作用。十四届六中全会提出树立精品意识,实施精品战略,要求我们努力创作一批思想性、艺术性统一,具有强烈吸引力、感染力的作品。

我们应从实际情况出发,认真贯彻落实江泽民总书记的指示和十四届六中全会的精神。什么是精品?我想至少应包括这样四个内容:第一,精品反映一个国家的文化水平,代表一个国家文化发展的方向。比如《中国美术全集》、《汉语大字典》、《汉语大辞典》、《辞海》等等。第二,精品意识就是战略意识,体现了我们出版工作者对事业的追求和奋斗。精品工程是战略工程,是每一个合格的出版工作者一生为之奋斗的目标,是为国家为民族文化事业所作出的贡献。第三,精品的本质是创造,是创新与突破。《史

记》、《三国演义》、《红楼梦》等等,这些都是精品。这些精品是千百年前的艺术品,今天仍然能打动人心,能够震撼我们,能唤起我们的追求和奋斗。我看道理很简单,只有抓住人类相通的东西,这样的精品才能超越时代。只要人类存在其艺术魅力就存在,也正是这样一些作品成为人类文化史上的坐标。我们要为这个目标去追求、奋斗。马克思说,我们的事业并不显赫一时而将永远存在。同样,我们的编辑也不要追求显赫一时,不要炒作一番,轰动一下,过后连自己都忘了还曾经当过这样一本书的责任编辑。如果我们的编辑能够编出一本像司马迁的《史记》、曹雪芹的《红楼梦》那样的著作,我觉得那就可称“不朽”了。

第三,我们要想做好精品工程,还要注意内外交流工作。

我们要输出,同样要引进;既要古为今用,也要洋为中用;要超越自身局限、包容万有,使中国的文化能够成为世界性文化。我们的前辈就是这样做的。中国的文化及其国际地位在人类历史的相当长的时间里是走在世界前列的。凡是中国历史上文化发达和繁荣的时候,都是中外交流频繁的时候。中国历史上出现过三次中外文化大融合,即东汉印度佛学引入、鸦片战争后西学东渐、十月革命后马列主义传播到中国。在外来文化和中国文化的每一次碰撞中,中国文化都得到大的飞跃和发展。所以,我们要强调中外文化的双向交流。

我们一方面反对固守传统,反对抱残守缺;另一方面,也反对全盘西化、妄自菲薄。从出版方面讲,加强中外文化交流,既要把国内好的东西推出去,又要把国外好的东西引进来。我们的出版社因为版权、资金等问题,出版的引进版图书越来越少,特别是科技著作,同时,输出的也很少,因为外国人看不懂中文。所以,要想提高中华民族在世界上的地位,要把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介绍到全世界去,必须认真研究,深入探索,千方百计地将中华民族的文化介绍出去;同时,注意加强中外文化的交流,要积极引进国外好的东西,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服务。

(原文载《中国出版》1999.11.)

图书分类评述

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类 图书出版综述

俞思念

在世界进入新世纪的前夕,关于马克思主义在时代长河中的历史命运和基本经验,成为理论界和出版界关注的热点话题被早早地提到讨论之中。同时,在近年来学习邓小平理论的高潮中,读马列、毛泽东著作也成为广泛的群众性活动。由此,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类图书的出版,呈现一派繁荣景象。广大干部群众出于理解和实践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热情,自觉地在学习中提高自己的认识能力和思想水平,使文化建设和图书市场生机盎然。特别是从1999年起,党内开始在一定范围内开展“讲政治、讲正气、讲学习”的“三讲”运动,更加推动着理论学习的深入。1999年中,这一类图书的出版在数量和质量上又有新的提高,并且和我们正在进行的重大实践紧密结合,显得有声有色。

这一年中,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类图书出版的基本特点可以概括如下:

第一,对马克思主义著作的研究和出版在向纵深发展

应当提到的是,这一年中关于马列主义著作的出版未有大的部帙,在数量上也并不很多,但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上是有分量的,对其基本思想的学习和探讨保持深入、广泛的态势,因为此类图书的内容往往融入各相关领域的出版物中,而未集中在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著作中。这可以说是近年来理论研究的新动向,是与邓小平一贯倡导的“读马列要精,要管用”的精神相一致的,它表明中国共产党人所坚持的理论联系实际的思想路线在现实得到进一步发挥。

这一年出版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选读》(人民出版社)就足以说明,学习马列仍然是当前图书出版必须列入的重点选题意向,但要在精选和适合不同层次的需要上下功夫,要在对马克思主义学习与

研究的深化和与中国实际的结合上取得突破。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结合产生了两次历史性飞跃,大大改变了中国的面貌。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的伟大进军中,马克思主义将获得蓬勃的生命力。马克思主义研究和出版在中国也将推向一个新的阶段,这是可以预期的。

第二,毛泽东著作的出版又展现新的亮点

1991年《毛泽东选集》(第二版)第1—4卷重新出版之后,对于毛泽东及其著作的学习与研究提供了最重要的文本。但选集还不能代替毛泽东著作的全部。《毛泽东选集》之外的重要著作的编辑和出版工作仍在紧迫的日程之中。其后,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相继问世。《毛泽东文集》第一卷、第二卷于1993年12月出版;《毛泽东文集》第三卷、第四卷、第五卷于1996年9月出版。这5卷编入的是毛泽东在民主革命时期的著作。

1999年6月,《毛泽东文集》第六卷、第七卷、第八卷出版。这3卷编入的是毛泽东在建国后的主要著作。至此,包括803篇文章、约230万字的《毛泽东文集》(人民出版社)全部出齐。这部在《毛泽东选集》第1—4卷之外,从毛泽东1921年~1976年的大量文稿和讲话、谈话记录中精选出来的文集,为广大干部和群众更好地学习和研究毛泽东思想,继承和发扬毛泽东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提供了博大的新材料。

这一年出版的《毛泽东文集》第六卷、第七卷、第八卷,编入毛泽东在建国后的近300篇文章,其中不少是第一次公开发表的。它对于了解、学习和研究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思想,特别是毛泽东和他那个时代党的领导层对于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对于了解和研究新中国历史的前27年走过的艰难历程,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